

DONGFANG DAODE
YANJIU

东方道德研究

第十一辑

傅永吉 任宝菊◎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东方道德研究(第十一辑)

◆ 傅永吉 任宝菊 /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道德研究.第11辑 / 傅永吉,任宝菊主编.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206-09282-4

I. ①东… II. ①傅… ②任… III. ①道德-东方国家-文集 IV. ①B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2423 号

东方道德研究(第十一辑)

主 编:傅永吉 任宝菊

责任编辑:关 静 封面设计:美印图文 责任校对:丁志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电 话:0431-85378028

印 刷:长春市显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印 张:18.25 字数:3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9282-4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仁义礼智信与建构共同价值观

(代序)

王殿卿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的纷争已有百余年历史，对待“仁义礼智信”也必然是见仁见智。在20世纪的前80年，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一直是被否定、批判、打倒和革命的对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1992年中国确定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文化发展战略从“革命”转向了建设，以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习惯思维定势也随着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长期与封建社会同行，但它不等于“封建文化”，不能与封建制度“同归于尽”，改朝换代使然，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则会永生；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也有精华，而精华多于糟粕；对待传统文化与道德要坚持批判与继承，而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两者不能颠倒；对待本民族的文化永远不能“革命”，只能建设等等，这些新的文化思维逐步被国人所接纳，进而侧重了国人文化的新自觉。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复兴中华文化、文化兴国的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中华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源泉，成为实现中国梦、中国精神的根与魂。

在这样的背影下，讨论“仁义礼智信”，就容易心平气和与客观公正。在此，仅从“仁义礼智信”与建构共同价值观的向度，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指正。

“仁义礼智信”，不是封建统治者“制造”出来的，而是历史的产物，

故能在历史长河中生存、发展，做出贡献。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过做人的三个标准，即智、仁、勇“三达德”，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而，孔子有生之年，为之奋斗的伦理道德，是“礼”。

公元前21世纪就有了原始礼仪。周代以礼乐治天下，“周礼”的建设与发展前后八百余年。早于孔子百余年的齐国管仲，提出“四维”，即“礼、义、廉、耻”，以礼为首，这些都是孔子所直接继承的伦理智慧。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是对中华伦理智慧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一生从礼、崇礼，对礼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以至对后世中华礼仪之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孔子，幼年“入太庙，每事问”。后来他“入周问礼”，“吾从周”。

孔子，面对“礼崩乐坏”，提出了“克己复礼”和“礼失而求诸野”。

孔子提出“富而好礼”和“礼之用，和为贵”，指出了礼的产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联系，而且凸现了礼的社会价值，礼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和谐。

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学礼，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文明之根。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将礼置于首要地位。

孔子强调学生要“博文约礼”，用礼的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并且能够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境界。他认为一个人能够用礼来约束或规范自己的言行之时，他也就很自然地遵守纪律和法律，这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提出“仁”，但他一生所推行的道德是“礼”，也就是说，“仁”并没有成为当时人们共识与实践的道德规范。而孔子在“仁”与“礼”的关系上，确有重要贡献。他的“内仁外礼”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将“礼”融入“仁”中，使人的情感成为“循礼”的内在动因。这种外在与内在的和谐、内化与外化的统一，是孔子对礼的理论升华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建设“礼仪之邦”的理论依据，为当今礼的教育和礼的建设提供了参照。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德”，是对儒家伦理的新整合。其中，以“仁”为首，“义”为次，“礼”从首位降到第三，“智”也从孔子“三达德”之首，退居末位。

汉代董仲舒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信”德，表明当时“信”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准则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此，“仁、义、礼、智、信”被推为“五常”，成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它将儒家伦理推向了新高度，并统领我国伦理道德教化与建设两千年。

虽然汉代“五常”是被官方认定、推向社会并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但是自汉至唐先后提出以“孝”治国，推行“举孝廉”的“吏制”，“孝”与“廉”这两种道德规范日益受到新的关注。因此到了宋代才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悌”与“忠”，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家”乃国之基。有了纵向的“父慈子孝”，又有了横向的“兄弟恭”，建构一个纵横交错的家庭伦理十字架，就可实现“家和万事兴”。宋代从“家”与“国”的辩证关系上，突出“孝悌”，并将其置于“忠信”的前面，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创造。这“八德”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新建构，是对儒家伦理、中华道德的新发展，它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

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

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新“八德”，调整了“孝”与“忠”，“家”与“国”的位置，表明民族和国家观念高于家族的观念，既是对古人“教孝即教忠”的继承，也适应了现代“国家至上”的价值观。

孙中山立足中国面对世界，将“忠”也就是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放在首位，建构“以国为本”的中华伦理道德观，是顺乎历史潮流，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新“八德”再次强调“仁”并加入了“爱”，将两者相连，既突出了儒家的“仁爱”，又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博爱”。国民党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义廉耻”，统称“四维八德”，在台湾沿用至今。

以孟子“五伦”为标志，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

宋代以“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家为本”的伦理道德观。

孙中山以新“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国为本”的伦理道德观。

这“三个为本”经历了三千年。分别成为不同时期道德教化的着重点，反映了不同时代及其发展对道德发展的必然要求。道德是历史的产物，又推动历史的不断进步。

而今，中国又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人”“家”“国”这“三个为本”在当代的辩证统一，必将对反映当今人际关系的新伦理、新道德，做出新的概括，从而建构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在新的千年推动中华道德有新的发展。

历史进程表明，道德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基本道德规范数量的增减，也包括每个道德规范在不同历史时期自身内涵的丰富与发展。

一些恒久不变的道德规范，是由人类社会生活长久不变的内容决定的，即使这些似乎“千古不变”、相对稳定的道德规范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自己的内涵。因此，每个历史时代的中国人，都有继承前人道德智慧的责任，又有“推陈出新”发展中华道德的义务。

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核心道德，就是中国和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作为常“道”，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担当了中华民族核心道德的功能，它是我国传统道德之纲，它牵动、影响和辐射着整个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对于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路向，锤炼民族性格，培育中华精神，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正是由于中华精神的力量，支撑中华民族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止。

韩国，曾经把“仁义礼智信”视为治国之纲。至今，它还展现在汉城（首尔）的主要建筑上。汉城的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各自名称如下：东大门是“兴仁门”、西大门是“敦义门”、南大门是“崇礼门”、北大门是“弘智门”，韩国的“仁义礼智”正是孟子的“四德”。独具匠心的是建筑在汉城市中心的“钟楼”，被誉名为“普信阁”，这“信”与“四德”合起来，就源自汉代儒家提出的“五常”。

新加坡，在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即时地提出“富而好礼”的治国方针，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治国之纲”。1990年发表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国家五大共同价值观：（1）国家至上，社会为

先；(2)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 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 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 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大共同价值观，就是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再强调的“东方价值观”、“儒家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和“东亚价值观”的具体化。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即“文化再生运动”的结晶。它使东方价值观所固有的强大生命力在现代社会得以展现。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我们目前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纲领，必须继续建设和完善。如果，从文化道德、社会生活、“两岸三地”、世界华人等视角，建构一个具有更加广泛意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可能会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更加广泛而相对恒长的文化社会基础，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巨大精神力量。

善待我国历史“古镜今鉴”，参考东亚经验“礼失求诸野”，对于承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中华美德，加以精选，进行现代转化，建构当代中华共同价值观，乃吾辈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一项使命。

（作者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创所所长）

目 录

仁义礼智信与建构共同价值观（代序）
..... 王殿卿 / 1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

1. 主体际性与公共道德重建
..... 傅永吉 / 3

2. 儒家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 刘国强 / 10

3. 关于《弟子规》与晋商诚信精神的历史感悟
..... 黄秀清 / 24

4. 从教育视角看辛亥革命
..... 董乃强 / 32

5. 伦理道德：化解精神危机之道
..... 陈学然 / 38

6. 论中国传统文化在书法传承中的有效体现
..... 王文影 / 44

7. 传统文人画中的禅意研究
..... 李伟波 李 琨 / 50

二、传统节日文化研究

1. 构建中华节日体系
..... 李汉秋 / 57

2. 春节——我们民族心灵的驿站
 萧 放 / 75
3. 中华传统文化为社区聚心铸魂
 李素菊 / 80

三、中华美德普及与实践

1. 说“习”
 周桂钊 / 91
2. 让孔子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站起来
 王殿卿 / 94
3. 儒家伦理与青少年德育
 张 践 / 96
4. 中华美德教育在未成年人犯罪防治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任宝菊 / 106
5. “三维互动”开展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及其效果的研究
 魏宏亮 / 115
6. 实施国学熏陶教育 锻造学生健全人格
 宋玉林 / 120
7. 品读·感悟文化经典 实践·积淀阳光品质
 北京延庆八达岭中学课题组 / 125
8. “读国学 品书香 润情操” 创“书香校园”
 ——北京延庆康庄中学国学诵读工作总结
 / 130
9. 自然而然之道
 ——日日新学堂的品格教育实践
 张冬青 / 134

四、中华美德教育师资培训

1. 两地同心 弘道明德
——第十届“中华美德教育行动师资培训班”综述
..... 任宝菊 / 141
2. 首都中华经典教育研讨会暨师资培训班概述
..... 冬 芳 / 145
3. 第五届海峡两岸读《论语》教《论语》师资研修班概述
..... 任宝菊 / 147
4. 感悟中大 沐浴教化
..... 陈俊梅 / 151

五、中国伦理思想研究

1. 儒家的基本精神
..... 孙宝山 / 157
2. 略论儒家与道家的义利观
..... 王 颖 / 163
3. 《论语》中所见孔子的天人观
..... 匡 钊 / 168
4. 孔子之“德”的多种面向
..... 叶树勋 / 182
5. 仕隐之间的孔子
——从“人能弘道”的角度解读孔子的仕隐观
..... 叶淑芬 / 196
6. 何心隐之死再考论
..... 任文利 / 208
7. 物质的沉沦与拯救：《多少算够》的消费伦理思想解读
..... 庞秋菊 王艳辉 庞道晶 / 221

8. 《颜氏家训》家庭道德教育思想浅析
..... 王艳辉 庞秋菊 庞道晶 / 226

六、董仲舒研究

1. 董仲舒人性论发微
..... 陈 升 / 235
2. 略论董仲舒的思想品格与特性及其历史影响
..... 林存光 / 249
3. 论董仲舒的《春秋》改制说
..... 黄开国 / 262



传统
文化
与
现代
社会



主体际性与公共道德重建

傅永吉

—

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是20世纪新创拟的哲学范畴。由胡塞尔（认识论的含义）创设，并经海德格尔（本体论的意义）而展开与发挥。A·莱西在《哲学辞典》说：“一个事物是主体间的，如果对于它有达于一致的途径，纵使这途径不可能独立于人类意识。……主体际性通常是与主观性而不是客观性相对比，它可以包括在客观性的范围中。”^①后被视为经典的“主体际性”定义。

主体际性概念超越了近代以来以主客二分为基础从而进行主体构造和客体征服的理性主义传统，开启以“研究或规范一个主体怎样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哲学新潮流。在一种意义上，主体际性及其围绕之而形成的哲学理论，并非纯粹理性，而是康德哲学的一种新的样式，即实践理性。

主体际性的根据在于生存本身。生存即主体间的共在，它主要聚焦于人的世界，即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思考和研究的视野是我我关系、个体与群体（社会）之关系。这里的主体不再是莱布尼兹式的自我封闭的“单子”，而是与其他主体处于广泛而经常的交互作用之中的主体。胡塞尔首倡主体际性理论，或在刻意避免近代哲学传统的唯我论

① A·莱西：《哲学辞典》[M]，伦敦：麦克米兰1986年版，第113页。

(个人主义)倾向,他认为单纯讲主体性,往往归结为个体性,而主体际性则意指个体的群体性,即个体的独立性与群体的交互性的统一。因之,主体际性也可理解为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有人主张将 Intersubjectivity 译为交互主体性或更加简单明了,任何健全的个体都是有独立性自足性而与其他主体经常地普遍(广泛的)交互作用中的社会动物。因之,主体际性概念是“原子式的孤立个体观念”的否定,又是大一统的整体性(传统理解的社会性)吞没、泯灭个体性的理论预设的否定。这里需特别着重解读的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人以主体间的方式“共在”着,既非“单子”也非“离子”,而是个性间的社会性的“共在”和社会的个体化的“共在”。海德格尔指出:“……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他人只能在一种共在中一只能为一种共在而不在。独在是共在的一种残缺的样式,独在的可能性就是共在的证明。”^① 海德格尔还指出了“共在”的两种基本形态,一为“处于沉沦状态的异化的共在”,其特点是个体被群体吞没;另一为“超越性的本真的共在”,个体作为能动独立自由的主体与其他具备同样特质的个体(主体)间存在着“自由的关系”。

主体际性既非反主体性,亦非反个体性,而是对整体性与社会性的二分二元对立视角或立场的扬弃、超越,即黑格尔所谓“辩证否定”。任何个体在本质上都是社会的,是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统一。而全人类社会总是个体的,它不仅是由个体构成并为个体的自我实现提供群体性社会性的基本条件,而各种迥异的个性的综合与扬弃后的文化整合,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社会性的。

主体际性概念的提出,重大意义在于申明了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共生性、平等性、交互性。胡塞尔的现象学试图通过所谓“现象学还原”对认识本身进行批判性思考,以回溯一个绝对确定的阿基米德点:即“纯粹的先验自我”。

胡塞尔晚年提出了自我和他人的“立场之可相互交换性”,以及“主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6~152页。

体间本位”，并试图在历史框架中予以阐释。

海德格尔认为：“人在本质上是首先存在于存在的开放性中，这种开放性是一片旷野，它包括了主—客体关系能呈现于其中的‘中间’地带。”

当代诠释学鼻祖伽达默尔将胡塞尔的主体际性（互主体性）还原为历史过程的实践行为之中。他认为，世界是我们通过语言和交流的合作而生存于其中的构架，实践则是一种“参与和分享”，一种与他人有关并依据活动共同决定着共同利益的过程。他令人意外地重视社会生活中的阐释和理解。他所创立的诠释学，核心内容在于阐明“适于表达作为一种交往过程的理解”。他指出，要完成表达和理解，必须借助语言。因此，掌握一种语言、参与一种交谈，本质上就是接受一种生活方式。真正把握了一种语文的精妙之处，并因而发生有效的对话（表达和理解），一定群体中的人方得以形成普遍的评判标准和共同立场、观点，一定的社会共同体才得以形成和维系。本文以为，这揭示了文化认同的语言、语义学基础，揭示了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在人类的群体生存的根本价值。人作为主体何以能与其他主体恰当互动？何以能够游刃有余地生活在这个群体之中而不自我边缘化或“被边缘化”？关键在于生命意义的认同，对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总体架构的理解和认同，对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则（道德的和法律的）的理解和认同，恰当理解并由衷地认同一定的文化所代表的制度设计的人文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如果不能做到与一定的群体文化的核心和基本的价值原则的自觉的由衷的理解和认同，那么就发生内在的和外在的碰撞，内在的文化碰撞会导致个体的人格扭曲甚至神经紊乱，而外在的文化碰撞则可能导致实际的肢体冲突或暴力对抗。在这一过程中，意义理解的方向是根据来自传统的自我理解的框架，去实现行动者之间的可能的一致。

19世纪下半叶以来，经过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家的努力，代表着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的转向，语言、对话、交流、理解以及人类实践活动成为哲学形而上学思考的焦点，总体上是回到生活，回到现实，回到活生生的人类生存实践本身，这即是在尼采之后的反传统、颠覆重估一切价值式和文化解构之后可能展开后现代意义的文化的重构。在后现代的主体际性的总体情境下，尝试公共道德的重建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